



《杜威在华学谱》顾红亮编著 2019年5月，华东师大出版社。

本书以年谱的形式呈现杜威在中国访问的行程和学术安排，时间跨度是从1919年1月至1921年12月，既展示杜威在华期间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也把杜威访华前后的背景和离开中国后的反应容纳进来，把“前因后果”呈现出来，更全面地展示杜威访华的丰硕成果和广泛的影响力。

整理“杜威在中国”的文献，不仅有技术层面的考量，如时间范围和文献范围的划定，而且有主导原则的考量。这涉及三个问题，如何对待资料的“全”与“不全”？如何研究性地驾驭和使用资料？如何看待日常生活的资料？

从多本史料中考察杜威到华准确日期

并非5月1日而是4月30日

第一，在搜集“杜威在中国”的档案文献方面，本书并不求“全”，而是求“有价值之全”，有利于掌握杜威在中国的学术性的日程安排线索。搜寻杜威在中国的档案文献的过程，是一个让文献“说话”的过程，让文献“敞开”的过程，让不同来源的文献考证校勘、相互交流、相互印证，澄清事实，更正不实记载。

例如，《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说1919年11月11日晚7时，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开同乐会，邀请杜威和各音乐家演说，并演奏中西音乐。实际上，当天晚上，杜威因病没有到场演讲。笔者从胡适的文章《在同乐会上的演说》中得到佐证。胡适

写道：“今日本有杜威先生的演说，因为病了没有来。——刚才会长已经报告——我今日到会，一则代达杜威先生的歉意；一则贡献我个人的意见。”结合《北京大学日刊》的启事和胡适的文章，确认杜威因病缺席同乐会。

又如，胡适把杜威抵达上海的时间记成1919年5月1日，杜威在演讲中也说自己到中国的时间是5月1日。胡适和杜威的说法影响了一些学者的看法，把5月1日确定为杜威抵达中国的时间。根据《申报》记载，杜威夫妇抵达上海的时间是1919年4月30日，不是5月1日。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等人到码头迎接杜威夫妇，并送他们到沧州别墅居住。《申报》的报道证实杜威和胡适的记忆不准确。



杜威妻女与中国进步人士合影，福州，1921

杜威并非演讲高手，并不像罗素滔滔不绝

还原想象中权威哲学家的美好想象

又如，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杜威在中国各地演讲，听众踊跃，广受欢迎。人们很容易把杜威想象成演讲“高手”。一些学者把杜威描绘成一位受人尊敬的明星哲学家。胡适感谢杜威“当了我们的年轻中国40年的老师”，安乐哲说杜威“有资格被冠以‘孔子第二’的称号”，托马斯·培里形容杜威是“20世纪的一个世俗化的利玛窦”，“他自己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来的思想交往的程度确实是令人惊讶的”。梁启超说：“中国人宜以杜威的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杜威的形象既高大又光辉。事实不尽然。当时一些人并不完全认可杜威的权威哲学家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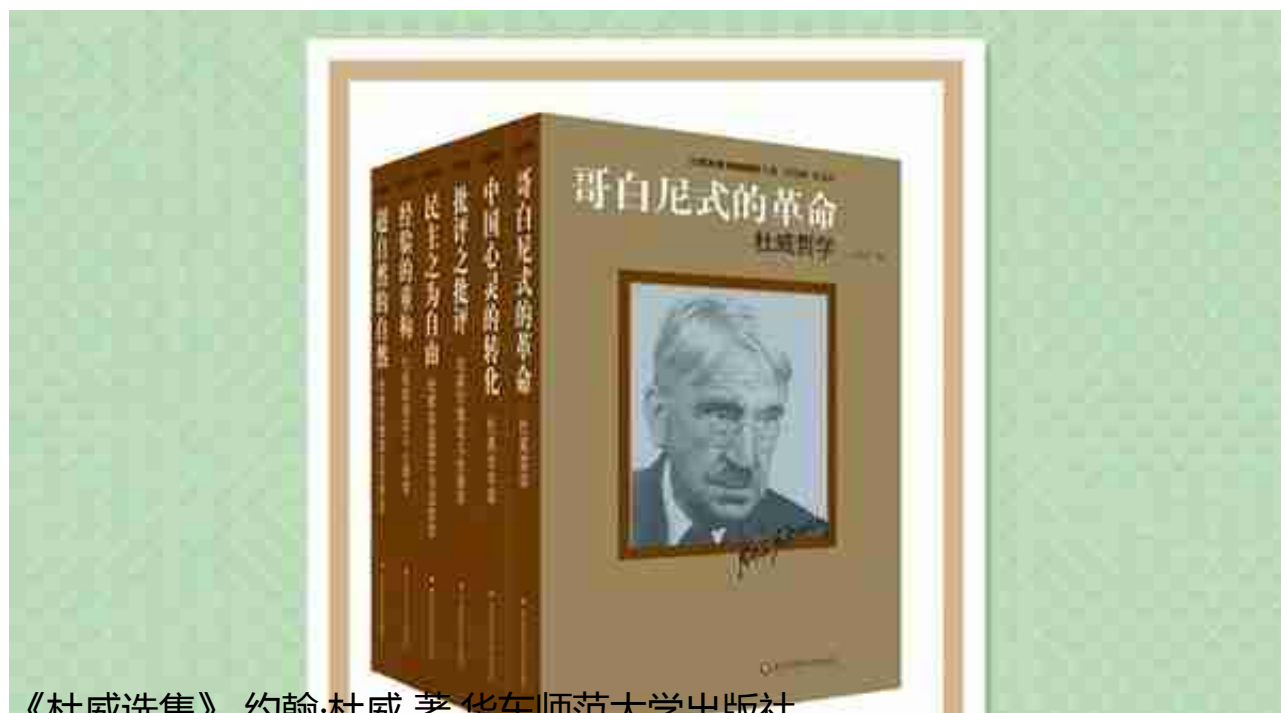
很多时候，杜威的演讲既单调又乏味。

胡适对杜威枯燥的演讲风格深有体会。“杜威不善辞令。许多学生都认为他的课讲得枯燥无味。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的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下去。在这里你可看出他讲课时选择用字的严肃态度。”1921年7月6日，在杜威离华前夕，胡适在日记中写：“罗素长于讲演，杜威先生称他为生平所见最完美的讲演者之一人。杜威不长于口才，每说话时，字字句句皆似用气力想出来的。他若有演稿，尚可作有力的演说；若不先写出，则演说时甚不能动听。”在胡适眼里，杜威实在不擅长演讲。

杨亮功对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课的效果也有记述：“他不善言辞，有时使用艰深字眼令人难解。不仅外国学生有此感觉，即是美国学生也不能免。因此我们这一班学生约有二十人，每人拿出美金五元请一位速记小姐，由她将讲辞速记下来，加以整理，分发各人。”杜威的“不善言辞”可谓声名远播。

胡适和杨亮功提到的杜威的“笨拙”讲课风格，也体现在中国的演讲中。可是，在中国的演讲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课不同，演讲现场有口译者，如胡适、陶行知、郑晓沧等，即时把杜威的演说内容译成中文。台下大多数的中国听众不懂英语，他们注意的不是杜威的英语表达，而是译者的中文内容。译者的口才调节着演讲现场的气氛，这稍稍弥补杜威演讲的不生动与不活泼。

在懂英语的青年学生中间，杜威的演讲也不一定受欢迎。潘光旦回忆他在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时说：“杜威也来讲过，当然是讲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学生时代的潘光旦在杜威的演讲现场呼呼入睡，可见杜威演讲之乏味。这也许与他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不感兴趣有一定关系，但也和杜威沉闷的言语表达直接相关。



《杜威选集》约翰·杜威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适讲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方还与杜威夫人之间的故事，该故事刊登在《每周评论》第29号上。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方还隆重邀请杜威夫人到该校演讲。在演讲前，方还请该校女教员转告杜威夫人，希望她在演讲时强调学生服从的重要性。杜威夫人婉拒方校长的意思。胡适评论说：“方还未免太笨了。他既然怕新教育的思潮，应该用他对待女学生的办法，把大门锁了，不许杜威夫人进来，岂不狠妙？既让他进来了，又要请他讲‘服从的紧要’，不但丢脸，也未免太笨了。”方对待杜威夫人演讲的态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师和官员的保守态度，即外迎内拒，表面上欢迎新思潮新观念，内地里坚持旧做法旧制度。

上述几个例子昭示出，杜威在中国固然有大受欢迎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受欢迎的一面。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杜威在中国的演讲都当作是深受中国知识分子欢迎的演讲。同时，我们也看到，普通人接受新思想新理念，需要一个较长的吸纳过程。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竭力传播与吸收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一个事实并不能掩盖另外一个事实：一些群体和一些个体对杜威实用主义持逃避或拒斥态度。

杜威的“闯入式”访华对中国和美国的意义：

日常生活记录中透露了思想交流的“密码”

第三，本书作为学谱，自然关心杜威在中国的学术性日程安排。但不限于此，杜威的学术行程和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思考、旅行、演讲、会友、写作、参观、聚餐，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其说我们关注杜威在中国的学术行程，不如说

关注杜威在中国的日常生活方式。

在本书中，我们关心杜威到了哪个地方，看了哪些景点，见了哪些人物，谈了什么话题，做了什么演讲，写了什么文章，给谁写了信，跟谁吃了饭，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并非无关宏旨；看起来反复杂多，容易熟视无睹，但深藏一般性结构。日常性无处不在，弥漫周遭。阅读杜威在中国的日常性，不仅可以读出中外学术交往、思想交流的“密码”，而且可以读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结构和文化心理特征。